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20SHIJI RENWENXUE DE FANSI YU CHONGGOU

20 世纪人文学的 反思与重构

张宝明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 世纪人文学的反思与重构

张宝明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人文学的反思与重构/张宝明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649-3601-3

I. ①2… II. ①张… III. ①人文科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C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5620 号

责任编辑 靳宇峰

责任校对 言 午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13(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296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出版旨趣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中期的近代中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启了以救亡图强为主题的民族复兴之伟业,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急剧变革,仿佛中华文明古国要在这历史长河的瞬间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要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完成多少代人的大同梦想。近代百年,有光荣也有屈辱,有进步也有徘徊,有为理想做出的牺牲,也有因盲从付出的代价,但毋庸置疑,这是传统中国迎接现代洗礼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奋起追求新生的时代,无数先进分子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做出了坚忍卓绝的探索与贡献,他们的所思所行给我们留下了值得认真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是以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丛书,将陆续出版海内外学人的相关著作。其中既包括首版新著,也包括再版佳作,既有宏观的理论思考,也有微观的专题探索,力求通过全方位多视角的系列研究,重新审视百年中国巨变,探寻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轨迹,揭示中华文明由古典向现代演进的路向,从而加深今人对历史和传统的认识与理解,繁荣和推进当代学术文化事业。为此,欢迎海内外学界同仁参与这一学术平台的建设,赋学术使命与同好志趣为一体,以学人眼力和学术话语,搭建历史—现实—未来的文化桥梁,为创新中华文化而贡献学人之心智。(马小泉)

目 录

从文学史到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转向（代序）

..... (1)

一、现代文学怎么样 (1)

二、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暧昧 (3)

三、现当代文学的变与不变 (5)

第一章 新文学元典与人之导向 (7)

一、“人的发现”：思想史意义上的文学传统 (7)

1. “人的发现”：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实给定的基调

..... (7)

2. “人”之导向：文学倾向与政治意识的较量 (9)

3. “人”学传统：五四文学探源的当代意义 (13)

二、“人之历史”：五四文学观念的世纪末回眸 (18)

1. “个人本位”：文学启蒙共执的思想平台 (19)

2. “人的文学”：脱胎于指归不同的文学观念 (21)

3. “人的发现”：观念的差异是最大的差异 (29)

4. 后五四时代：文学症候与历史反思 (34)

三、“人之异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尚武倾向 (37)

1. 背景：被近代以降的民族屈辱激活 (38)

2. “五四”：文化设计中的武化人格 (41)

3. 尚武: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命题	(45)
第二章 人文与启蒙的张力(上)	(49)
一、“人道主义”的两副面孔——中国新文学内在气质的歧义	(49)
1. 同气相求:“人”的呼唤	(51)
2. “人道主义”:新文学的筋骨	(55)
3. “人道”异化:两种谱系的衍生	(61)
4. 两副面孔:寻绎 20 世纪文艺意识形态的原始基因	(71)
二、越位的人道主义:“五四”启蒙残缺性的再反思	(74)
1. “人道主义”的兴起:历史与现实的催生	(75)
2. 从“戊戌”到“五四”:人道主义的递嬗	(78)
3. “仁道”与“人道”:似是而非的暧昧	(81)
4. 真经难觅:传统情结的纠结	(83)
5. 滑向“民粹”:人道主义的越位	(88)
三、“人”证:20 世纪中国启蒙研究之再出发——以新青年派和 学衡派为中心的考察	(92)
1. 两种图谱: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	(93)
2. 何以“立人”:自由意志与责任意识的颀颀	(98)
3. 立人之争:“人事之律”与“物质之律”的错位	(104)
4. 二歧融合:历史困境的突围	(109)
第三章 人文与启蒙的张力(下)	(114)
一、启蒙情怀的生成:还历史以真实	(114)
1. 《新青年》研究者的“事后”质疑	(114)
2. 名刊:在现代性焦虑中生成	(118)
3. “金字招牌”:在文化品牌与商业品牌之间	(128)
二、失去砝码的天平:两种理性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走向	(139)

1. 心同此“理”:一本同仁杂志的“公同担任”	(141)
2. 求同存“异”:一个知识群体的和而不同	(144)
3. 进退失“据”(上):在“科学”与“人文”之间	(150)
4. 进退失“据”(下):在“民主”与“法治”之间	(155)
5. 虚实相“间”:在理性与理想之间	(159)
第四章 “文白之争”的历史悲情	(167)
一、“文化”社会学:《新青年》导引的“文白之争”	(168)
1. 文化与社会	(168)
2. 《新青年》:强势的语言势头	(171)
3. 自谦与自负:两种理性观	(179)
二、现代性焦虑:《新青年》“历史”叙事的发生	(182)
1. 语言:焦虑的极致	(182)
2. 白话文:语言的 Democracy	(186)
三、历史悲情的扩张:世界语的吊诡	(195)
1. 世界语:通向大同的路径	(195)
2. 世界语:“人造的理想”	(203)
四、现代性与传统:历史的循环	(214)
1. “理性就是语言”	(214)
2. 语言暴力的再生	(216)
五、“文白之争”的百年反思	(219)
1. “文白之争”:思想史的元命题	(220)
2. 回望来时路:触摸到文白之争的历史命脉	(222)
3. 回归与超越:重塑中国语言文化的基因	(231)
第五章 文学、道德与启蒙(上)	(236)
一、两个启蒙文本的交锋	(237)
1. 解构抑或建构:对一位新启蒙主义者的质疑	(237)
2. 建构抑或解构:对一位后启蒙主义者的回应	(246)

二、新启蒙与后启蒙：两种启蒙话语系统对话的可能

..... (254)

1. 新启蒙和后启蒙：“本是同根生” (254)

2. 新启蒙与后启蒙：“相煎何太急” (260)

第六章 文学、道德与启蒙(下) (269)

一、道德形而上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

..... (270)

1. 启蒙：怎一个“道德”了得？ (270)

2. 启蒙：道德又岂可脱离干系 (274)

3. 吊诡：在启蒙与反启蒙之间 (276)

4. 启蒙：文学生命的底线 (280)

二、文学、道德与良知：知识分子的角色、权力及其使命

..... (283)

1. 道德的时代性：何谓成熟的道德观念 (283)

2. 权宜之计：道德的相对性 (287)

3. 道德、理性与良知：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292)

三、启蒙的恐怖：我为什么不是一个道德形而上主义者

..... (296)

1. 启蒙与道德：思想史上的元命题 (298)

2. “戊戌”与“五四”：近代中国启蒙态势的架构 (300)

3. 无为与有为：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定位 (303)

第七章 “人文学”的反思与重构 (309)

一、中国近代学科转型语境下“人文学”的选择与重构

..... (309)

1. “分科立学”与中国人文学科的转型 (310)

2. 学科转型与古典人文传统的失落 (316)

3. “体验之知”与人文学主体性的确立 (321)

二、人文学：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再诠释 (326)

1. 学科本体:越位带来的困惑	(328)
2. 学科疑案:西方化与中国味	(331)
3. 人文学术: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天然纹路	(338)
4. 文学史和思想史:平行并交叉着	(341)
后记 人文启示:示威还是示弱	(346)
一、两重气质:人文与启蒙	(346)
二、人道与人文:以《新青年》与《学衡》为例	(348)
三、示弱与示强:在不确定与确定性之间	(352)
四、人文学断想及其他	(354)

从文学史到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转向（代序）

中国向来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对炉火纯青的学问也有“亦文亦史”的美誉。然而“文”（学）与“史”（学）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不分家则是一个无人关心的问题。按照传统人文学科文、史、哲的划分，它们既有都是“人学”的共同研究对象，但又是独立的学问——即相对独立的“问学”方式。尤其是当我从2004年3月25日《社会科学报》的“学科检讨”栏目中读到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走向与归宿问题时，我那从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过程中的学科思绪再度被激活。这个兴奋劲儿被撩拨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

在一个反思学术规范、检讨学风的时代，《社会科学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来讨论，显然是十分敏锐的。可能，这会引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异议甚至是不满，但它提出质疑是为了拯救，进行批判是为了建设，其创新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回想当年从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的经历，面对今天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状况，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的体会。

一、现代文学怎么样

正像我们有些同仁已经指出的，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

它一开始就存在着模糊的定位。也就是说,其学科的理念不够科学。其实这里涉及对这一学科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问题。撇开 20 世纪 50 年代只有两三部几乎雷同的现代文学“统一”文本不说,就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在我读本科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史仍在一个模子地复制、一个导向地克隆、一条主线地延续。研究者是在体制下写作,是在一个中心指导下“正确地”编著。

这里,难免牵涉众多尤其是具有远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眼光。为了创新,也是为了走出现当代文学形单影只的误区,不少研究者已经将目光瞄准西方的理论。在瞄准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放大,并欲以此得到丰厚的收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学者将转向归结为——不是“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己的田”——也是颇有道理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企图高屋建瓴、另辟蹊径,将思想史的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相嫁接,从而摆脱文学研究单薄瘦弱的状态也是实情。老实说,我在开始阅读思想史的时候有过这种“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念头。然而,一旦你进入思想史的殿堂,你便会身不由己、全身心地投入。至少,这是我个人从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的真实体会。

必须看到,从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与本来就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的学术路径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在前者,他们更多的是在做两类事情,或者至少是以文学的底子从事思想史研究。北京大学的陈平原、钱理群等都是中文系的教授,清华大学的汪晖、解志熙也是文学史起家的学者。从北京到上海,回望一下复旦大学的陈思和、上海大学的王晓明等沪上学者可以说与京师学者异曲同工。不过,恕吾直言,文学史的转向者在把握整个思想史脉络时,如果不彻底,难免有图像模糊之嫌。这里,我所说的“不彻底”意思是指兼做文学史、思想史两类事,或说文学史、思想史研究之间相互纠缠。以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

文章而言，葛兆光、许纪霖、朱学勤的思想史研究与上面提到的诸位的研究显然有着文风的区别。

这里，又涉及一个敏感的学科问题：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科学性。就2004年3月25日《社会科学报》的“学科检讨”栏目中李俊国的《现当代文学已经疲惫》一文而言，显然抓住了学科的根本，但作者将“学科理念”与“探索精神”相提并论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其实现当代文学的“疲惫”不是学科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研究主体如何为现当代文学准确而又科学地定位问题。所谓准确，也就是要摆脱李俊国先生所说的“两张皮现象”。对此，随同李俊国一文以采访形式发表的《穿透300部文学史之难》提出的“通”史观、“打造文学博物馆”则是走出疲惫泥淖、激活现当代文学研究独辟蹊径的学科创新。遗憾的是，两文都未能将文学史表象背后的历史真实给予到位的描画。

二、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暧昧

我所说的“鲁迅时代的终结”不是要结束鲁迅，而是要结束鲁迅时代。如同我们走过的路所标明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一段时间，无论是写还是讲中国现当代文学，鲁迅首当其冲，而且基本上是唯鲁迅是讲、是写。换句话说，鲁迅是衡量一切文学人物、文学现象、文学作者的标准。除却“老三篇”必背，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甚至到大学，鲁迅的杂文、散文、小说绝对占据上风，而且是主打。于是，中国文人的鲁迅腔调、文学家和研究者的鲁迅姿态在大陆比比皆是。5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研究鲁迅、谈论鲁迅最稳妥、最安全。在政治标准第一的岁月里，鲁迅成为现代性文学的“标本”。

这一切源自于毛泽东1940年为鲁迅的定调。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这样推崇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以后的现当代文化、文学也就是这一条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文学。由于时代和年龄的关系,笔者上面提到的几位转向者也都是研究鲁迅起家的。鲁迅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以及革命家的多重身份,都被研究者纳入视野,最后文学家和思想家都被冠之以“革命”的头衔。研究文学家的鲁迅离不开思想家的鲁迅,因此在中国那个思想危险的时代,从文学入手研究学问是大势所趋。钱理群、汪晖等人先以鲁迅作为突破口,从而在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投机取巧,而是时代使然。同时,这也不是说他们价值精神与创新活力贫弱。事实上,他们的研究比起同时代人是最富活力和前卫意识的。时至 80 年代中期,当我坐在现代文学馆去听舒乙等人筹办的讲座时,钱理群先生还主谈了鲁迅在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的座次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认为鲁迅首先应该是思想家然后才是文学家。就这,他已经是对一个传统文学(政治)模式的大胆质疑了。至少,在毛泽东以及后毛泽东时代,这是具有挑战性的原创。

以鲁迅这样一个文学家、思想家作为研究对象,自然就会产生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双重研究者。这些研究者以后的视野拓展本身也就意味着现当代文学自身资源的单薄与贫瘠。就我个人对现当代文学的疲惫以及研究者转向的观察而言,这是对文学史学科的重新定位,也是对现当代文学学科意识的拔高。这个创新首先来自于研究者对过去现当代文学格局的不满。今天的这个“学科检讨”应该是过去研究者“跳槽”的一个顺理成章的延伸或说质变。这是他们对过去单一的政治模式的厌倦与挣脱。不满意鲁迅时代,更不满意于那个时代留下的心理阴影,于是那

些学科建设的敏感者率先走向了思想史的畛域。从文学史研究走向思想史研究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与视野，这充分说明那个时代需要尽快终结。固然，现在的我们不需要故意作出跳槽或厌倦的姿态，但从学科本身去检讨现代性文学的“时过境迁”的研究格局无疑具有继往开来的集大成和前瞻性意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不同意将“此一现象当作文学研究领域积蓄起的高度和能量的自然外溢”。在我看来，中国文学史研究者目前所积蓄的理论和思想能量还远远没有达到什么外溢不外溢的程度。

三、现当代文学的变与不变

一位从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这样说：“它们却没能触及此一现象所蕴问题最核心的层面，就是此一现象中的相当一部分学者，并不是认为文学研究领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他们的课题了，而是相反，他们之所以转向，其内在驱动力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把握和思考文学课题。”贺照田从自然科学转移到中文再进入思想史研究的“跳槽”现象本身显示出他是一位有自我价值标准的学者。不过，上面这段话的表述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准确。以我个人从文学转向思想研究的学术经历来看，根本的转向并非反映在撰写文学研究论文还是发表思想史论文上。在笔者这里，关键还是问题意识的转移或说捕捉。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史的问题还是有眼光和视角区别的。也许这样说有些武断，但它却也反映出一个基本常识的改变：文史也分家。

现当代文学要走出疲惫的精神状态，并不是从自我的转向或说侵占其他学科的领地就能一劳永逸的。事实上，现当代文学研究要摆脱自身的危机恰恰不是远离而是要更坚实地立足于自我的那块田地进行扎实的耕耘。贺照田先生的一厢情愿的表

述就是这个意思,但却只是一个愿望,并非“过去”学者转向的基因。这也是我所说的“不变”。不变是为了尊重本学科自身的规律,是为了本学科得以更正确地定位,更科学地发展。否则,这个学科将无立锥之地。文学的博物馆意识也正是要把符合文学基本属性的内容加以张扬,使它成为文学史长河中永恒不灭的精神雕像。“变”则是提倡学科的延伸、交叉、丰富。现当代文学只有扬长避短,博采众长,才能在今天的学科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成不变的学科是不存在的,但是若把自己变得面目全非也未尝不是自身的悲哀。思想史可以为文学史撑腰打气,但它却不能越俎代庖。学者可以兼做文学和思想史的研究,但却无法将两者合二为一。

1988年,当笔者撰写硕士论文时就已经逸出了现当代文学的学科。那时我的导师任访秋先生极力促使我与师兄沈卫威从事陈独秀和胡适的思想研究。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新文学也即是现当代文学的“革命”与“改良”的鼻祖,是他们促成了中国文学的转型。同时,他们又都是现代思想史上的重量级人物。这样,我的思想史研究就“一发而不可收”。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师兄弟的共同转向中,我和师兄沈卫威、解志熙等人还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我的问题意识已经不是立足于文学,而他们却在诚恳地守望着文学研究的园地。可能很多同仁会为自己的“叛变”惋惜,也会有同仁为我的转向叫好。但转变之阵痛只有自己才能体会个中滋味:“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当我跳出现当代文学的园地而回眸这块我自己十分熟悉的园地时,我祈愿现当代文学一路走好。

第一章 新文学元典与人之导向

一、“人的发现”：思想史意义上的文学传统

关于五四文学传统的命题，可以说是一个已经几乎被学术界同仁说到尽头的一个话题。而就五四研究本身而言，似乎它又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以王晓明的“重评五四文学传统”以及钱理群“胡风与五四文学传统”^①的命题来看，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五四的渊源关系已经作出了十分到位的叙述。但恕吾直言，到目前为止，五四文学源头的处方里究竟设有几味药，我们还缺乏必要的探索与分析。即使以前有过这类的研究，也还是没能提供一个清晰的脉络。

本人认为，只有澄清了五四文学的源头，才有文学传统下的清流。但愿我们对五四文学源头的挖掘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思想梳理。

1. “人的发现”：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实给定的基调

对“人的发现”命题，我们可以从五四当事人的“夫子自道”

^① 参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版；钱理群：《胡风与五四文学传统》，《文学评论》1988 年第 5 期。

以及在五四启蒙文学理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的回忆里找到足够的论据。就以那位五四“设计”的原创者陈独秀为例，他就曾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里非常明确地说：“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具体说来，就是“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①至于陈独秀先生述说的“人”之具体内涵，则是一个不够明确的概念。不过，这倒成为他集结中国文化先驱之实力，共襄新文化、新文学大业的一个优势。五四新文化运动里的另一位文学理论巨匠胡适这样评说五四文学的宗旨：“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这，同样是基于对人权，尤其是下层人民的教育权着眼的。他一再援用易卜生戏剧中的人物形象来阐释自己奉为至高的“健全个人主义”。他说：“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②比胡适的个人本位思想论述更为突出的“人”之原理者，要数周作人对“人的文学”的提倡：“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为了防止误解，周作人先生还特意指出：“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③鲁迅先生以自己的觉醒折射出“人”的觉醒：“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

①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5号，1920年4月1日。

②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6号，1918年6月15日。

③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